

出版说明

由于我国“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事业的发展，广大科学研究人员，文化、教育工作者以及党、政有关领导机关，需要更多地了解台湾省、港澳地区的现状和学术研究动态。为此，本中心编辑《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委托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本专辑所收的资料，系按专题选编，照原报刊版面影印。对原报刊文章的内容和词句，一般不作改动（如有改动，当予注明），仅于每期编有目次，俾读者开卷即可明了本期所收的文章，以资查阅；必要时附“编后记”，对有关问题作必要的说明。

选材以是否具有学术研究和资料情报价值为标准。对于某些出于反动政治宣传目的，蓄意捏造、歪曲或进行人身攻击性的文章，以及渲染淫秽行为的文艺作品，概不收录。但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有些作者所持的立场、观点、见解不免与我们迥异，甚至对立，或者出现某些带有诬蔑性的词句等等，对此，我们不急于置评，相信读者会予注意，能够鉴别。至于一些文中所言一九四九年以后之“我国”、“中华民国”、“中央”之类的文字，一望可知是指台湾省、国民党中央而言，不再一一注明，敬希读者阅读时注意。

为了统一装订规格，本专辑一律采取竖排版形式装订，对横排版亦按此形式处理，即封面倒装。

本专辑的编印，旨在为研究工作提供参考，限于内部发行。请各订阅单位和个人妥善保管，慎勿丢失。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服务中心

目次

社会教育与国家建设	李连兴	一
人文社会应有的省思	杨孝谏	一一
未来研究, 研究未来	郑继宗	一三
要向平凡处变革: 论男女平等之思想	文思慧	一六
“学术”与“道术”——兼论孔孟“学术”之特质	陈修武	二一
青年人在现代社会的地位与价值	邓元忠	二四
发挥语言的正功能——从语言功能看社会问题	《大学杂志》新闻组	二六
坚强富有而长久的人生之路	王邦雄	二九
公务员以身作则改善社会风气:《新出路》社论		三三
认识社会知觉的复杂性	卢美贵	三五
当前的社会建设	申庆璧	三九
让子女向罗素看齐——书香门第的重建及地位的再提升	王农	四三
大众传播与国民生活品质(上、下)	楚嵩秋	四四
西方社会性解放新黑潮——美加的乱伦与性侵袭儿童邪风	冯冯	四六
解决“社会问题”保障“社会安全”	岳峰	五〇
维护社会治安, 提高生活品质		五二
台湾地区窃盗案猖獗		五三
建立自由安全的社会	乐和	五四
龙舟登“龙门”		五五
经济复甦失业率降低		五六
制裁神人共愤的暴行		五七
水污染	庄采玲	五八
国民寿命预期提高		五一
农药工厂公害严重影响环境生态		五九
台北市空气混浊污染严重		六〇
手心向下, 心灵丰饶	邬昆如	六一
安全卫生设施多未符合标准		六三
安全教育思想忽略实质意义		六四
不要当一个机械人		六四
苏联青年的风貌	坦皮斯特	1
与工厂青年谈交友恋爱婚姻	吴信安	5
未来台湾都市生活空间的变化	陈明竺	7
香港“卖身史”——两本有关蓄婢的专书	杨国雄	9
要重新认识香港	黄国权	14
日本的“色情进口”	伟业	17
台湾的地下十妖	张伟业等	20

“地下餐厅”的诱惑	伟 业	24
配合未来经济转型之人力培育与运用	吴家声	27
美丽的新世界——二十一世纪的社会	张系国	32
从未来学看台湾的未来	赖金男	36
台湾人民的第三波	柴松林	42
加速变迁的就业市场	刘玉兰	45
“华人时代”浅探	晓 晴	48
迈向商品质的均富社会	魏 镛	50
未来学与国家前途	赖金男	55
75万美元诈骗案	谢 诚译	59
比利时的华人	欧伯南	60
美国社会面面观	李 成	63
华人关注的几个问题	薛君度	66
谈本届亚太影展中的几部影片	黄美序	68
未来世界将男女不分	云 明译	71
男女有别其来有自	侯家鲁	72
未来趋势女人将领导男人	张博容译	74
我们要对下一代尽义务吗?	何美君	75
八〇年代社会福利制度发展的模式与过程	苏武华译	78
补 白		
生活方式的巨变	谢 诚摘译	三四
商罪案增四成, 涉款逾六亿		13
加强对色情刊物, 民政科拟设审裁处		65

社會教育與國家建設

李建興

社會教育是國家建設的利器，國家建設是社會教育的目標。我國的社會教育自民國元年，蔡元培先生在教育部設置專司，主持其事，七十幾年來，對於國家建設有許多重要之影響與貢獻。例如：民國十六年左右平民教育以「除文盲，作新民」爲主旨，針對當時中國人民「貧、愚、弱、私」四大弱點，從事文字、生計、衛生和公民等四大教育，這是社會教育與國家建設結合的實例。又如：民國二十六年對日抗戰發生，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之考驗，當時的民衆教育改以喚起民族意識，激發抗戰情緒，爭取戰爭之勝利爲主旨，成立「社會教育工作團」、「實驗戲劇教育隊」等，深入民間，發動民衆抗戰，這是社會教育工作者投入國家建設行列的另一具體行動，可見社會教育對於國家建設的重要性。

近三十幾年來，政府以臺灣爲復興基地，全國上下，勵精圖治，奮發圖強，在國家建設的歷程中，已創造了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義建國模式，可是在這同時，由於社會的快速變遷，及文化轉型的結果，使我國社會產生了許多重大的變革。例如：第一：經濟的發展，造成國民生活水準的提高及價值觀念的轉變；第二：政治的民主化，帶來全民參與政治及政治溝通意念的高漲；第三：工業化及都市化，產生人口高度流動及都會區의各種問題；第四：家庭結構和功能的改變，核心家庭的崛起，使得傳統倫理道德和家庭制度出現危機，以及第五：學校教育普及化和均等化的結果，形成全民知識水準的普遍提高及文化多元化之現象。這些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及文化等方面的變遷，都有其正面或反面的價值或影響，使我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無論如何，都是國家建設過程中值得重視的問題。

社會問題產生的原因，相當複雜，在學理上，有所謂：社會解組說，文化失調說，價值衝突

說及偏差行為說等。不過，歸根究底的說，社會是人羣的結合，人是社會的重心，一切社會問題都是人的問題，人的觀念、思想有了偏差便是社會問題層出不窮的主要關鍵。社會教育在實施全民教育與終身教育，它要透過各級學校、圖書館、博物館、科學館、藝術館及各種大眾傳播媒介，給予全國民衆公民教育、健康教育、語文教育、科學教育及藝術教育，以實現終身教育的理想。因此，面對三十幾年來，國家在建設過程中所產生的問題，社會教育應扮演何種角色？履行那些功能？完成怎樣的任務？這是國家現代化過程中，極爲重要的課題，亦是本報告的重點所在。茲就管見所及，以個人認爲最重要的國家建設的三項目標，即：(1)建立「富而有教」的社會；(2)建立「知而好德」的社會；(3)建立「和而樂進」的社會，綜述社會教育在國家建設中，應有的努力及其可能之貢獻。

建立富而有教的社會

我國政府與民衆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努力，三十幾年來已開創了一個中國歷史上最富裕的社會，我們每一個家庭，每一個人都是耕耘者，亦是享受者，這種經濟發展與經濟繁榮，不必以各項統計數字測知，我們都是見證人。我曾與一羣四、五十歲的朋友談起他們年輕時候的情形，幾乎每個人都說，他小時候過著貧苦的生活，吃地瓜、沒有鞋子穿，上學都用走路……可是現在的年輕人，有吃用不盡的食物或衣服，活在聲色光電的世界，如果說有「斷層」，這種上下兩代生活方式的差別就是斷層，如果說有「代差」，這便是造成上下二代代差的真正原因。當然這是經濟繁榮與進步的結果，亦是我們努力爭取來的。

我國的經濟發展亦被稱爲開發中國家的一大奇蹟，以臺灣這樣自然資源有限的地方，能創造空前經濟繁榮的局面，與世界上任何國家比擬毫不遜色，不用說鄰近的韓國、菲律賓等國家，最近我到歐洲一趟，發現歐洲各國所謂四、五顆星，每天一百美元的旅館，其設備水準並不比我們的國賓、統一或圓山大飯店好。此外，我也發現，原來只有在委託行才賣的外國貨，現在臺北的各大百貨公司都開設專櫃陳列、出售，而且據說生意不差，可見我們民衆的生活水準已是世界第一流的了。

這種經濟發展固然提高了全民的生活水準，却也帶來了社會問題。社會學家說：歐美各國以

一百五十年的時間才完成的經濟發展，我們不到三十年就到達了，這種時間短促，驟然降臨的經濟果實，必然會帶來某些文化失調的問題。這種問題，我把它分爲二大類，一類是「暴發戶」的心態及行爲，一類是「暴利犯罪者」的心態及行爲。

所謂暴發戶的心態及行爲，主要是指那些經商貿易成功的民衆，由於賺錢的容易、經濟的富裕、口袋裡的多金，於是他們便視金錢爲身外之物，呼之則來，揮之則去，出手大方，生活闊綽，表現一副有錢老闆的嘴臉。進一步在有了錢之後，則以恣意揮霍爲能事，大吃大喝似乎是中國人的民族性，一桌酒席萬金，餐廳天天客滿，所以才會有每年吃掉一條高速公路的說法。其他如衣、住、行及樂方面，也無不是處處表現暴發戶的心態及行爲。這樣的例子太多了，不用細說。不過，我倒比較關心，有些家長也以爲有錢就可以買到「自己孩子的心」，可以買到「廉價的知識或友情」，我的意思是說，有些有錢的家長，以大量零用錢來滿足自己對孩子的愧疚，以聘雇家庭教師來補償自己無法與孩子的相聚，這樣可能就危險了。哈佛大學教授邁布拉斯說：「人雖然有了錢，可是在他還沒有學會做闊人以前，很容易將錢用錯地方或做出優事，人既如此，國家亦然。」真是很有道理。

所謂暴利犯罪者的心態及行爲，主要是指社會上可能有些人看到別人賺錢、看到別人成功，他們跟著眼紅，他們不僅做白日夢，想要日進斗金、驟生暴利，而且採取具體行動，幹下經濟犯罪、民間倒會、搶劫銀行、郵局，以及打殺偷盜等不法情事。近幾年來，我們社會上接二連三，發生這些嚴重的犯罪問題，影響大家對社會秩序及安寧的信心，莫此爲甚！

其實，無論是經濟的暴發戶或暴利犯罪者，他們所擁有的不當的心態或行爲，並不能全部去責備他們的不是或錯誤。這些錯誤可能的原因之一是我們的社會有「富而無教」的問題。我們的社會，這三十年來突然富裕了，富裕得這麼快，我們的國家或民衆都沒有這方面的經驗或準備，也沒人給他們適當的教育，因此我們就有「手足無措」、「無以自處」的痛苦。同時，也就產生上述這些社會風氣和犯罪等問題。解決之道，就是要建立「富而有教」的社會。

社會教育是建立富而有教的社會可行與應行的途徑，因爲構成當前社會中堅分子的是成年人，造成當前社會問題主要的也是成年人，成年人是目前社會上最迫切需要教育的人。據臺灣地區

人口統計，目前（民國七十年底）我國人口結構中，六歲以上不能讀寫者所佔之比率為百分之九點八，約有一百五十五萬多人，小學程度者之比率為四四·三%，約有七百萬人。可見，目前我國國民教育程度仍然偏低，這些人是社會教育的主要對象，要建立富而有教的社會應從這些民衆著手。

其次是如何教？社會教育的方法最爲活潑、生動而有效。可採學校式的教育方式，如：補習學校、文化講座等；可採機構式，如圖書館、文化中心等；亦可採家庭式的教育，把「教育送上門」，如：廣泛運用大眾傳播媒介、報紙、雜誌、廣播、電影、電視等，「處處是教室，人人皆可學」，真是可以實現有教無類的理想。

再其次是教什麼？針對當前富而無教的現象，我以為社會教育要教育社會大眾的有三種教育，即：(1)生計教育；(2)消費者教育；(3)經濟倫理教育，茲分別簡述之。

第一、生計教育即是教導民衆「賺錢之道」，這種賺錢之道應以中國的人文主義精神爲主，須本「人乃役物，而非役於物」，並且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這種生計教育的理想應落實於職業訓練與國民就業輔導工作，以實現「壯有所用」的理想。

第二、消費者教育，也就是教導民衆「用錢之道」，這種用錢之道最重要是強調心物合一論，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應予等量齊觀，不可偏失，這種消費者教育應落實於國民生活的消費型態上，加強休閒娛樂活動，並建立社會責任觀，「取之社會，還之社會」以完成大我的理想。

第三、經濟倫理教育，這種教育應以「人」與「物」的關係爲出發點，培育生態環境維護與均衡的觀念，進而建立國民的羣己關係，培養社會公德心，提升人生理想的境界，發揮「正德、利用、厚生」的崇高理想。

未來我國社會更需要經濟的持續成長與不斷發展，以便更大步地邁向富裕國家而前進，但是在未來經濟發展過程中，我們更必需將經濟生活與社會文化相結合，建立經濟發展的倫理基礎，以確保經濟建設的輝煌成果。

建立知而好德的社會

教育建設包括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均在增進國民「知」的權益，滿足國民求知的慾望，提

高國民知識水準。近三十幾年來，我國的教育建設始終秉持幾項重要目標：

一、提高全民接受初等、中等或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

二、賦予全國國民接受均等教育的機會，不因性別、年齡、種族、地區、宗教、社會階層等有所差別。

三、充分發展各級學校教育，投資教育經費，改善教育素質。

四、相信教育為立國根本，並相信教育可促進人類的幸福與進步。

依據教育部統計指出，民國七十學年度，我國有五二四〇所學校，平均每百平方公里為一、四九一所，學校設立極為普遍。以學生數而言，在全國一千八百多萬人口中，各級學校學生人數共有四百六十四萬多人，即每一千人口中有二五·九九人為在校學生，亦即每四個人中有一個是學生，就學機會很普及。再就各級學校就學率而言，學齡兒童就學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九·七六，國小畢業生升學率達百分之九十七·四一，國中畢業生升學率達百分之六十八·六六，高中畢業生升學率為百分之八十三·一五，目前我國大專院校一〇四所，大專學生人數三十五萬多人，這些數字與比例，較之先進國家毫不遜色。

教育的普及，國民知識水準的提高，這是國家建設的一大成就。平心而論，過去三十幾年來，我國在教育建設方面亦曾創造——中國歷史上空前未有的成就，以及為開發中國家教育建設樹立了一個成功的模式。可惜，我們在誇耀經濟成就之時，却常低估教育的貢獻，這是令人百思不解的一件事。

對於這個問題，如果我們從學校教育的內容去探討時，也許可以找到部分答案。我國各級學校教育的目的與內容，先總統 蔣公早在民國四十二年即指出犯了：(1)升學生主義；(2)孤立主義，與(3)形式主義的弊病。這麼多年來，升學主義依然瀰漫，考試永遠領導教學，使各級學校教學不能正常化，教師永遠從事知識灌輸的工作，學生一直是被動地接受填鴨，所以有人說，我們的大學生祇是「蔣光超」（教授講，學生光抄筆記），而我們的中、小學生永遠是「貝多芬」（背誦就得高分），這真是不好笑的笑話。

真正教育的理想目標應該是「知」「德」並重的，亦即知識的學習與品德的陶冶應該是一樣的重要，偏偏我們的學校教育是重知輕德，甚至學生滿腦子記滿了倫理道德信條，一到了實際生

活時，却全忘光了，一點也實行不來。有人說，在今天這樣學校教育下，我們祇培養兩種學生：一種是功課好的學生，却是最「自私」的人；一種是功課差的學生，却是最「自卑」的人。自私的人祇顧自己的功課與成績，對老師、同學或學校都十分淡漠、冷酷或無情，舉了業沒有社會、國家責任感，祇會「來來來，來大學；去去去，去美國」，所以老師對他（她）們都很寒心和失望。自卑的人忘記了升學或就業，做了既不升學亦不就業的青年，於是糾眾破壞學校公物，或找老師與校長理論，最後可能遊蕩街頭，或淪於作奸犯科。這種歸類也許有些誇大，但當前學校教育不重品德教育的流弊，值得我們重視。補救之道，就是建立「知而好德」的社會。

個人以為，社會教育是建立知而好德的社會可行與應行的途徑，關於社會教育對於加強青年品德教育可行與應行的理由與方法，上一節已提過，不再贅述。茲就社會教育加強實施青年品德教育的方向，提出三點看法：

第一，加強幼兒教育，奠定青年人格發展之良好基礎。

幼兒教育（六歲以下兒童的教育）又稱為「幼稚」教育或「學前」教育，因此，在我國各級教育中是最弱的一環。據七十學年度之統計，目前我國有幼稚園一、二八五所（專設八六五所，附設四二〇所），學生人數一九一、六九三人（私立者一四二、九〇九人）。當年四至六歲的幼兒近八十一萬多人，祇有四分之一的幼兒進了幼稚園就讀，而且是在那些師資、設備、場地與教材教法等都可能不够水準的幼稚園就讀，怎能不叫人就心呢？

在某些國家，幼兒教育與社會教育合流，是重要的社會教育活動。二百年前，福祿貝爾為幼兒教育作了開路先鋒，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佛洛伊德指出六歲以前，一個人的人格已奠定了一生發展的基礎，近年來，美國教育家紛紛提出教育機會均等的原則，重視文化刺激貧乏或社會不利地位對於幼兒教育的影響，大量創辦「學前教育中心」，給予家庭貧困或偏遠地區的幼兒，營養、生活教育、衛生保健習慣與基本讀寫能力的教育，這是值得我們借鑑的地方。我們在延長十二年國民教育時，若亦能重視向下紮根的幼兒教育工作，奠定青年品德教育的良好基礎，應是教育的當務之急。

第二，加強生活教育，發揮傳統家庭的獎誨。

我國傳統的家庭，非常重視兒童的生活教育，朱柏廬治家格言謂：「黎明即起，洒掃庭除，

要內外整潔」；朱晦庵小學句讀亦云：「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孔子亦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這些都是強調生活教育與品德教育的重要。

今日的家庭，父母祇要孩子讀書、考好成績，從來不要求孩子的儀容、行爲或書房等等之整齊、清潔，更不忍心要求孩子幫忙洗碗筷、掃地或做家事，這些父母的觀念都有待改進，以促進青年生活教育之成功。

第三，加強親職教育，擴大學校教育的效果。

學校加強辦理社會教育，這是教育當局三令五申的重點工作，加強親職教育的實施，可以爲學生的父母與學校間搭起一座橋梁，並且可將實施學生品德教育的期望，影響父母親，並使之付之實踐。

親職教育是學校教育之延長，教育家長則是教育學生的重要條件，親職教育的成功，不僅可擴大學校教育的效果，並爲建立和諧社會的重要方法，可見親職教育，十分重要。

總之，社會教育與學校教育的合作，加強青年品德教育，是建立知而好德社會的正確途徑。

建立和而樂進的社會

民主政治的理想目標是「和而不同」，亦即公平競爭但不失其和諧。這三十幾年來，政府破除一切險阻艱難，舉辦歷次的民主選舉，許多公職人員和民意代表，都是透過選舉而產生，尤其近幾年來，我國經歷國際政治姑息逆流的衝擊，和敵人中共的各種統戰，在重重考驗中，從未改變實施民主憲政的決心，這便是期望從「和而不同」中，實現國家民族之利益和目標，爲民主憲政奠定永世不拔之根基。

但是，民主政治真是一條艱苦而漫長的道路，民主政治的理想並不是一蹴可幾。三十幾年來，民主政治的經驗中却也曾經過各種大風大浪，產生許多糾紛或暴戾，甚至因少數人的濫用自由而造成破壞團結和諧、違法亂紀的事件，這是令人痛心的事。

從社會心理的觀點來看，我最關心民主政治實施過程中，「兩極化」的現象及其流弊，這就是：有部分人過分「熱衷」政治或選舉，有部分人對於政治或選舉又過度「冷漠」，過與不及皆

非好事。

就目前政治建設而言，政治參與、政治溝通是近幾年最熱門的話題，擠政治窄門是當前許多青年人以為榮宗耀祖、光大門楣的唯一管道，於是學而優則仕，商而優則仕，似乎除了政治選舉外，沒有其他上進之路，沒有其他出人頭地的機會。我以為參與政治選舉固依個人之條件與志趣而定，別人很難加以置喙批評，惟若政治慾望過高，或祇為圖個人私利，置政治或道德規範於腦後，甚至藉機嘩衆取寵，以謾罵或顛倒是非為能事，騙取選票或博人同情等，這種參選的動機本身已不道德，競選手法尤其可恥，這實在不是正常的民主選舉所應有之現象。

相反的，有一部分民衆，以為政治是醜惡的、現實的、冷酷的，祇有「富人」、「野心人士」才會去參與政治，這些民衆乃表現對於政治的過度冷漠感。其實，政治乃管理衆人之事，「人是政治的動物」，豈有那個人可以脫離現實政治之範圍，孤立而無羣的。可見，在民主政治過程中，社會大眾仍須積極予以政治教育，以建立和而樂進的社會。

社會教育對於國家政治建設有其可能之貢獻與影響，因為社會教育在政治社會化過程中可能扮演極為重要之角色。目前我國政治文化具有一種非常重要的特性：即是全民的參與。然而，目前我國人口中，尚有一百餘萬的文盲，而他們均屬年紀較長已有投票權者，他們是否已具有對於民主政治的認識及判斷能力，是一項值得注意的問題，至於其他參與政治的社會組成分子，教育程度與社會背景亦均相異，他們是否全有適當的政治價值觀念，以參與民主的生活，也是值得注意的問題。可見社會教育在協助不同教育程度及社會背景的參政人民，建立合適的政治價值觀念與態度，是一種重要的任務。

若具體來說，社會教育對於我國民主政治之實施，應朝下列二個方向而努力：

第一、加強民主政治教育，促進政治文化的進步。

美國政治學者凱伊說：「所有國家的教育制度都是在教導未來公民政治秩序的基本觀念與價值。」李普西在其「政治人」一書中認為：「一個人的教育程度愈高，愈能形成民主的價值，贊成民主的措施」。因此，今天我們要貫徹民主政治的實施，就必須要加強民主政治教育，建立人民正確的民主觀念，培養民主的態度與精神，才能使民主政治在我國生根茁壯。

而民主政治教育的實踐，平時即應透過各種集會邀請專家學者講解民主政治的原理真諦，並

在歷次的選舉中，適時透過報章雜誌廣播電視媒介，及發動大批的專家學者，分赴各地給予民衆正確的民主政治觀念與作法，假以時日，選舉的弊病可以減少，而全國國民的民主素養與習慣，必將逐漸養成與落實。

第二、加強法治教育，培養知法守法的公民。

先總統 蔣公曾說：「在法治原則之下，人民和政府同樣受法律的支配，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如此，人民與政府之間，人民與人民之間，各守分際，相互尊重，民主政治才能歷久不渝，深植根基。」

目前我國社會充滿了暴力、犯罪的氣氛，如何化戾氣爲祥和、講道德，已幾乎緩不濟急，只有求之法律的制裁，而最基本的工作，還是應發揚法治教育，使我們所生存的社會，成爲講理的社會，全國的國民，成爲守法的羣衆。如何達到這種地步？我以爲當務之急應是：

1. 利用大眾傳播工具開闢有關介紹法律常識及討論法律問題的專欄或節目，藉以增進民衆的法律知識和提高法治精神。

2. 人民對執法人員如有頑抗、侮辱、暴力等行爲，應嚴重處罰，以提高公權力。執法人員如犯貪瀆舞弊等違法失職行爲，亦應嚴重處分，以提高公信力。

3. 編印法律叢書，普遍分送青少年及其父母閱讀與實踐，以促進法治教育向下紮根。

美國社會學家華德說：「教育是社會進步的主要動力。」我國在實施民主政治過程中，一方面應力求社會的安寧與和諧，一方面更應在安定的社會秩序中，不斷革新，力求進步，以早日邁向和而樂進的社會。

結 語

國家建設是全面性、整體性和持續性的建設，社會教育祇是國家建設過程中一個重要的環節而已，而且個人以爲這種重要性與可能的貢獻，還要看政府或教育當局是否重視它，是否能肯定它的價值而定。如果本報告以上的分析是正確的話，個人以爲今後我們尚須對社會教育做更多的改革與努力，其具體途徑是：

- 第一、教育當局應肯定指出這是社會教育的時代，當前正是我國社會教育發展的適當時機。
 - 第二、從教育部、教育廳(局)到縣市政府每年教育經費中應以百分之十以上，辦理社會教育。
 - 第三、各級社會教育機構應重視專才專用的原則，促進新陳代謝，提供升遷管道。
 - 第四、縣市文化中心應即開展活動，加強辦理地方藝文活動，提升文化水準。
 - 第五、建立社會教育機構完整系統，並重視社會教育的研究，以發揮其專業的效果。
- 總之，加強社會教育，加速國家建設，以建立富而有教，知而好德以及和而樂進的社會，是國家建設之理想目標，願大家共同努力，促其早日完成。

(本文作者，爲國立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主任)

(原載：中央(台)一九八三年二六卷二期三二—四〇頁)

迎接科技時代，

人文社會應有的省思

楊孝濂（東吳大學社會系教授）

社會轉型期間

亟需建立新倫理

中國文化的一些特質，是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農業社會型態所規劃而出的，例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一些價值體系和行為模式。這是因為我國是以農立國，從農業社會轉變成工業社會，在這過程中，家庭的結構會變更，學校的結構和功能會變更，社會的結構會變更，當然人與人之間的價值體系也會發生變化。

因此，我認為在社會發展的整個過程當中，我們必須要努力來制訂工業社會的新倫理，也就是說，對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價值體系、行為模式等，必須要重新調適與配合尤其重要的，在整個社會發展的階段裏，特別請求工作效率，資源的有效運用，以及人與社會之間一種積極的互動情態。這就是我們在工業社會所亟需建立的新倫理關係。

但是，這並不表示在新倫理建立的過程中，我們要放棄五千年的歷史文化，也不是偏持「中學為

體，西學為用」的觀念，而是在現實的社會裏，在中國的文化特質體系之下，自然而重新規劃出來的一個價值體系和行為模式。而這些價值體系和行為模式都是古代文化體系裏的精髓，我們固然要勉力保留。舉例來說，中國人講「天人合一」，講人與自然的結合，也就是人運用自然，但不破壞自然的一種科學關係。這種理念正是我們現在社會最需要的追求的，但它卻在我們追求現代化過程中被忽略和遺忘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特別要強調「第六倫理觀」。所謂「第六倫理」，就是除了古代所謂的君臣、夫婦、父子、兄弟、朋友等五倫之外，加上「人羣關係」——即「人」的社會角色，「人」的社會功能，使每一個人能認識自己所擔任的使命。這樣子我們纔可以把中國古代的「情理法」秩序改變過來，而建立一個新的社會倫理關係。

以積極的態度迎接科技時代

將人力資源轉為提升生活

科技時代的來臨，在許多人對它缺乏充分的瞭

解情況之下，難免會心生恐懼。特別是對於一個新的東西，沒有辦法預測的事物，或者自己能力所不能控制的東西，大家都希望能保存現狀。因為保持現狀比較有安全感，要突破就比較困難了。因此對科技懷有恐懼感，可以說是是一種自然的現象。

我認為科技應該跟我們的社會，我們的生活結合在一起。舉例來說，以前我們吃飯，米是主食，菜是副食。現在情形正相反，菜變成了主食，飯是副食。科技也是如此，等大家都慣於把生活與科技結合在一起，就不會再有恐懼感了。又如電視機剛問世時，曾經帶給人類很大的震撼和驚恐，大家認為電視機時代一來，許多大眾傳播媒體都會宣告沒落，甚至奄奄待斃。如今電視成了日常家用電器的一種，電視節目也提供了大眾必需的娛樂，大家對它的恐懼就不復存在了。這說明科技並不足懼，但假如我們的社會沒有一個順應的心態，就免不了會有這種驚恐和懼怕了。

許多文學家、社會學家、哲學家對未來的社會，都以自動化、電腦化做為一個想像，來塑造另一種新的社會形態。他們認為到了他們所假想的社會

時代時，人的特質就沒有了。因為企業自動化、電腦化之後，無論是工作效率或資源的運用，都對「人」會產生不良的影響，也使許多人遭到淘汰的厄運，甚至於一些科幻小說家認為到了那時「人」根本不需要了。

這些論調，對於研究社會學的人來看，這種恐懼是多餘的。假如我們能夠把科技的發展用來強調工作效率的提高，及資源的有效運用，那麼，我們人力的資源便可以做為提升我們生活品質的投資。因此，科技愈發達的國家，愈有文學家、思想家、科學家、政治家：努力地提昇我們的生活品質，規劃我們的社會結構、政治體系、經濟發展的形態。因此，科技不但不會帶來不良的影響，造成努力過剩，更能利用衆多的人力，轉而投資在提昇我們的文化品質及精神層次上。所以每一個人對於科技時代的來臨，都應該抱持一種非常積極的心態來迎接。

舊文化應找尋新出路

科技可以賦予新生命

再談到文化的問題。我認為任何一國的文化體系與傳統，都是延續性的、轉化性的，根本沒有一「拋棄」這個名詞。假如我們拋棄了過去，那麼就不會有現在，也不會有未來。中國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下來，在五千年的優良文化傳統中，有許多的精髓、精華亟需要加以保留和發揚光大的。但也有許多的風俗習尚或文化積弊，因為科技文明的來臨，社會結構的變遷、新倫理觀念的建立而必須予以改善或淘汰的。正因為舊文化面臨了這種危機，所以我們必須替它另尋新的出路。

現代社會最缺乏的，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就是社會學家所一直努力在推動的新的工業社會倫理。這些倫理結合中國五千年悠久文化的精髓，

使它具有現代化的理念和意義，並跟我們現在社會結構所強調的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強調人的功能和社會責任相吻合。而科技時代的來臨是必然的，不管是我們自動迎接，或是被迫接受，誰都無法阻擋它的來臨。在這種情況之下，人的社會角色如何被肯定，政府如何給原有的傳統文化注入新的養分、新的意義和作用，如何使我們的經濟、社會、政治制度來配合科技，都是重要的課題。

關於這一點，我認為有關機構必須做到以下三點：

第一、要促使工業的生產效率提高。社會產業結構發生變化，自動化的經營方式代替人工，可以把剩餘的人力轉移到提昇生活品質，研究文化特質，充實精神層次上，使社會能產生大文學家、思想家、政治家等，讓本土文化在科技的運用之下，文化的內涵能更充實，更豐富，也更蓬勃。第二、從事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可以使整個農村的結構變更，把大部分的勞力、財力用在支持工業的發展上。因此，在科技時代，我們也應該再來一次土地改革，以合作經營或歸併的方式，把小地主的農田重新規劃，轉移一些人力來刺激工業的發展。農村結構一改變，接着經濟結構也會變更，而規劃出以高效率低污染的科技為主。第三、社會結構要變更。我認為現代社會應該建立專業知識，使每一個人在專業體制下，維護自己的地位和工作效率，把過去的舊觀念與老包袱拋棄。這樣子，即使面對科技時代的來臨，也不會心懷畏懼。

文化、科技、生活三者結合

才能建立一個理想的人文科技社會

五四時代，主張全盤西化的學者喜歡以我們吃飯的碗，比喻我國的固有文化。他們認為我國積存

了許多衰腐陳舊的習尚，正如一個破舊的碗一樣，應該要摒棄不用。我認為這是不正確的。因為以文化整體來看，是沒有所謂的破碗或有裂縫的碗，而是在於碗的功能有沒有被正確的運用，它是被用來吃飯的？還是被擺起來供奉用的？這兩種的意義是不相同的。

「文化即生活」，我們的文化並不會因為我們沒有穿長袍馬褂，而說我們不是中國人，也不會因為中學生的週記不用毛筆寫，就會喪失我們的文化。問題在於「用」與「不用」，文化是要用的，要把它當做吃飯的工具，一樣地與我們的的生活結合在一起，而不是把它擺著好看的。所以我覺得文化的碗不會破，過去從未破過，現在也沒有破，未來也不會破。

科技也是如此，它只是一個工具而已，誰來用這個工具以及如何來用這個工具，才是重要的。許多人認為科技輸入會帶來文化侵略，因為依賴科技，也會產生文化依賴。對於這些論調，我是極不表贊同的。我認為科技也是一種生活，一種社會活動，而每一個人每天也都在接觸科技的產品，例如電視、電話、錄音機等都是，只是因為科技介入了生活，使得我們的生活方式、結構、形態，也都要隨著它而改變，因此而引起一些人的恐懼。事實上，這完全是一種不健康的心理和對科技文化的誤覺。總之科技祇是一個工具，誰來用這個工具才是值得慎思的問題，況且中國人來用這個工具與外國人來用這個工具，它的意義是迥然有異的。所以，祇要我們每一個人對民族有相當的自信心，生活中國化、科技生活化，將生活與文化密切結合，那麼，我們的文化不但可以有新的生命、意義和出路，我們的社會也將是一個深具豐富內涵的人文科技社會了。

THE FUTURIST



未來研究 · 研究未來

鄭繼宗

人類總是生活在時間的三個點上：那三個點就是昨天，今天及明天，也就是所謂的過去，現在及未來。時間上的每一分一秒都經過這三個點：此刻都含有過去現在及未來的意義。比如說，現在這一刻就是過去的未來，而同時又是未來的過去。未來代表着過去加上現在。光明的未來必需仰仗着輝煌的過去及充實的現在才行。缺乏計劃，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事方法，絕無前途可言。

每個民族有着每個民族的特性：有些民族總是陶醉在過去的光榮史蹟中，有些民族只是注意着生活的現狀，而有些民族却是憧憬着未來——所謂活在計劃及希望中。有些則是三者兼顧到恰到好处。

我們中華民族是一個比較喜歡生活在過去和現在的民族。對未來，我們似乎沒有像過去那麼關心，也沒有像對現在那麼重視。五千年悠久的傳統文化；無所不包的經典史籍；綿延不斷的道統，偉大的四大發明，一提起來，那個炎黃子孫不臉上有光。社會上所歌頌的是博古通今，學校中所提倡的是，半部論語治天下。因為「鑑往可以知來」，所以前車之鑑成解決問題的法寶。我們有着嫦娥奔月的神話，却沒有用火箭登上月球去看看嫦娥真面目的計劃。我們總喜歡活在祖宗的餘蔭裏，所以我們的今天多半是花在算以往的舊帳，改正過去的錯誤，以及用以前存下來的錢上。舊帳好像是算也算不清：大陸上的三反、五反、清算鬥爭、文革、整風、整黨以及清潔精神污染等等就是明證。昨天的錯是如此之多，改掉一個，却發現另二個，結果是只好不了了之。寶貴的光陰就被我們浪費在昨日中，又有時間去計劃未來呢？

西方則不同，尤其是美國人；他們總是每分每秒兢兢業業地工作，時時在為未來的百丈高樓奠基

雖然他們也懷念過去，但只將過去祖先們的創業精神當作建設現在及計劃未來的基石，可是却不為昨天所困。他們的信用卡制度，總是在鼓勵人們花下月的錢；遠程計劃及經濟政策，總是鼓勵人們做明天的事。計劃下一個世紀的一切。美國人也懷舊，但並不墨守成規；重視現在，但不隨波逐流；最重要的是他們對未來也相當注意，花在為將來着想的時間及精力比誰都多。他們要求不斷地更新，不斷的改進。所以美國機關中多半都有長程計劃單位（Long Range Planning Unit）。美國大學裏有對未來研究的課程（Future Studies）。美國出版界有專門雜誌研究討論將來的一切。美國還有對未來研究的專門組織——「未來研究學會」，這些都證明了美國人對未來的關懷與重視。就因為對未來的憧憬，所以一直存在在他們腦海中的，就是如何改進目前狀況？如何讓自己及子子孫孫生活得更美好，更快樂。這就是僅有二百年短短歷史的美國能成為自由世界領導者以及能在科技上一路領先的主因。他們努力於現在，計劃着未來，因此「未來學」這門學問，就應運而生，而且方興未艾。

未來學究竟是什麼？下面筆者願意先談談它的淵源。根據美國百科全書中的解釋：未來學是一門以科學方法去預測、準備和影響未來的科學。它的宗旨是讓人們去尋求更美好的方法去面對未來。它是以合作方式，協助人們去求得知識、技術以及作心理準備的工作，以求能適應未來高度科技化的社會。未來學（Futurology）是二次大戰時發源於歐洲的「新興學問」。德國未來學者佛來赫坦（Ossip Flechheim）首先創出「Futurology」辭以及提

倡研究未來的觀念。此後，法國的約瑟那（Bertrand de Jouvenel）、荷蘭的伯拿克（Fred Polak）和美國的可安（Herman Kahn）、哈爾曼（Willis Harman）、西爾波德（Rober Theobald）、貝爾（Daniel Bell）和杜夫勒（Avin Toffler）等未來學大師，相繼著書立說，到處講演開會，倡導不遺餘力。他們希望着明天比今天和昨天生活得更充實。他們在世界各地設立許多專門組織以從事對未來的研究，其中最重要的組織是世界未來學會（World Future Society）。

世界未來學會是一九六六年在美京華盛頓成立，為全球研究未來學規模最大的組織。工作人員雖僅有二十餘人，經費却有百餘萬。現在會員三萬餘人，約有八十個分會，遍佈全球各地。自創始至今，該會由社會學家 Edward Cornish 任主席。該會宗旨有五：

（一）在不偏袒任何意識形態及思想模式原則下，使人們對未來及未來研究給予合理的重視。



世界未來協會的機關刊物《未來雙月刊》

（二）促進對未來作負責而謹慎的調查研究。
（三）提倡對「未來學研究方法」的有系統發展及改良。
（四）喚醒大眾對未來學有關研究及活動之瞭解。

（五）加強世界各未來學社團、機關及個人間的聯繫工作。
為配合及達成該會宗旨，目前該會發行下列各種刊物：

未來雙月刊（The Futurist: A Journal of Forecasts, Trends, And Ideas About The Future）是世界未來協會的機關刊物。由該會主席 Cornish 任主編，每年出六期，每期逢雙月發行，約八十餘頁。以去年十二月的刊物為例，該期中學術性文章有五篇，其中有一系列專門討論奧威爾（George Orwell），對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小說極盡挖苦之能事。作者諸公都是未來學專家，對《一九八四》當小說讀毫不反對，但當它為未來學經典，他們則大不以為然。《明報月刊》第二一七、二一八期曾有專文討論《一九八四》這本小說，筆者在此不想重述。

雙月刊中除有學術論文討論將來一切外，還有專欄介紹新產品、新思想、新方法、有關未來的新書以及新活動等等。讀者若有興趣入會，會費為美金二十元（雙月刊訂費包括在內）。

除了雙月刊外，該會還發行《未來觀察》（Future Survey）月刊。此刊物是文摘性，將有關未來學書籍、文章、報道、摘要分類